

The System Selec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News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中国报纸产业化 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

黄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System Selec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News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中国报纸产业化 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

黄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基于博弈的视角/黄蓉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ISBN 978 - 7 - 5161 - 7547 - 7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报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中国 IV. ①G21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石书贤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01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屠忠俊

中国30多年来的传媒经营管理改革主要在经营层面，特别是在经营体制层面上进行。体制决定方法，经营制约管理。上位层面的问题没有确定解决，下位层面的问题的解决是否最优或可行往往无从判定。因此，尽管与发达国家在体制上基本无问题可言，经营方向明确的媒体比较，中国媒体在具体的管理制度、程序、方法、技巧的“诺浩”（know-how）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但媒体内部管理层面的具体业务，如财务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业务的改进，在这30多年中，基本并没有被作为重要的探求内容。

从经营管理改革实际遵循的路径来看，30多年来，中国媒体基本是在步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全面实行放权让利、“两权分立”与承包制、股份制试验与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优化资本结构与“抓大放小”等阶段。在国有企业经历这些阶段的时候，国有媒体往往于一段时间内保持审慎的滞后，看准了再采用基本精神及做法与国有企业大体一致的方式进行相应改革。传媒经营管理改革在20世纪后期推行得相当稳妥，可以说是颇有章法、大见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学习。

“改到深处是产权。”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遭遇“产权”的壁垒或堑壕。经历公司治理改革、三年（1998—2000年）改革攻坚、扭亏脱困、大规模改制、职工身份改革、外资并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阶段，国有企业在过河的深水区“摸石头”，步履较此前艰难。有鉴于国有制企业产权改革的某些失误与挫折，媒体在利用自己积累起来的空前壮大的经济实力，跨越“产权”壁垒或堑壕，开创新的改革局面方面，就颇为踌躇了。

这种踌躇，主要是因为，与国有企业相比，国有媒体接受国家的控制

更为直接、更为严格。中国30多年来的传媒经营管理改革是在国家（执政党与政府）与媒体之间，传媒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下进行的。国家自上而下地倡导传媒经营管理改革，以减轻自己办传媒的财政压力，遂使媒体强化经营管理的诸多举措得以顺利推行，在诸如集团化建设一类的事情上，还能够加速推进。但国家在从新闻自由到传媒产权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的决策方向还有待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后确定，又使媒体在一些核心体制问题——诸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资本运作，跨媒介、跨地区发展——的操作上，往往反反复复，进退失据。

上述情况反映在传媒经营管理的学术研究上面，就是把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作为解释和解决中国传媒经营管理改革的实际问题的框架的做法渐渐受到重视。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则是引入博弈论，从诸多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博弈（合作的或非合作的）的角度来进行制度分析，把制度视为博弈达至均衡时，参与博弈的各方的战略组合的固化。制度就是博弈的规则；法律、法规、政策、产权制度、契约合同是正式的博弈规则，惯例、习俗、礼仪乃至种种潜存的因袭的传统则是非正式博弈规则。

黄蓉基于博弈视角对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是在对中国传媒经营管理改革总体格局具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她抓住“制度”和“博弈”两个关键词，参照实际情况，展开理论思维，表现出对学术前沿的敏锐感觉和方法上求新探索的勇气。

黄蓉的研究把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演化归结为渐次复杂化的三个阶段的三类博弈——总体性社会下的单方（国家权威使报社的经济利益诉求无从表达和实现）博弈，改革开放初20年左右时段的两方（国家与报社）博弈，中国加入WTO后的三方（国家、报社、资本）博弈——的结果，提出并论证了理想的报业制度应是四方（国家、报社、资本、受众）博弈达至均衡的结果的命题。她的描述、分析、论证建立在对传媒经营管理改革的历史事实的把握和对大量相关文献的解读的基础上，是传媒经营管理学术领域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对“制度”的界定，是由研究的语境和分析的目的决定的。在中国，对国有传媒而言，正式规则，尤其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是决定性的制度供给；它们构成施于传媒的直接且高效的制度约束。传媒经营管理

改革中的制度变迁，往往发端于媒体在市场环境下不得不然的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变迁获得国家认可，进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才能转化为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不被国家认可，当事媒体的改革或者就走回头路，或者只能在体制边缘勉力维持。国家权力是着力于经济建设（1978—1986年），抑或经济调节（1987—2002年），抑或公共服务（2003年以后），抑或社会和谐，决定着国家对传媒经营管理的政策，决定着传媒经营管理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传媒经营管理研究者固然可以首先把制度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家正式制度与传媒改革举措的互动上，但也应该进而关注市场环境中的产权制度、契约合同等类正式规则，惯例、习俗、礼仪乃至种种潜存的因袭的传统等类非正式规则在传媒经营管理改革中的诱致性变迁中的作用。这种进一步的关注将会启发我们考虑下述问题：博弈参与者要有很高的认知水平，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单一的博弈论模型并不适于处理诸如感情、传统、思想裂变与飞跃之类可能因素对人的个体、群体乃至国家共同体的行为的影响这样的复杂性问题。如果把社会科学视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统一的、整合的研究应综合经济学、人类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来建立解释框架，而且使用的数学方法也应超出博弈论的范围。我们寄希望于黄蓉这样的新锐社会科学研究者立足于各自的专门领域，以开放的胸怀、开创的勇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贡献出新的成果。

至于说到作为确立理想报业制度的前奏的终极博弈格局，似乎也不就是四方（国家、报社、资本、受众）博弈或者再多若干方的博弈。东晋名相谢安的哥哥叫谢奕，字无奕。中国人在名与字的配套称呼上，往往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思维；“奕”与“无奕”可作一例。“奕”的极致是“无奕”，以“无奕”终结“奕”，必须首先有“百奕百胜”的功夫垫底。人类社会的制度建设行为上的看似“无奕”，无非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经过反复的多方博弈，达至均衡（其可能性由三个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定理给出）；人们接受作为均衡结果的制度安排而不深究，甚至遗忘生成“无奕”的“奕”的漫长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二是人的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他有极高的认知水平，却不秉持个人主义，在和谐中完成合作，无须患得患失地去“奕”。这里所说的“人的发展”，既指个体的人的发展，又指群体的人的发展，还指各种规模上的人的群体的公共事务的处理者

(国家就是在一国规模上的国民公共事务的处理者)。至少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行为上的看似“无奕”的出现，还只会对应于前一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基于博弈视角的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	3
第三节 研究思路	5
第四节 概念的界定	11
第五节 文献综述	17
第六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难点	22
第二章 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	25
第一节 报业制度变迁的主题转化	25
第二节 报业制度选择的行为逻辑	28
第三节 报业制度选择的博弈主体	38
第三章 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	43
第一节 总体性社会报业制度选择环境分析	43
第二节 单方博弈：实现政府最大收益	50
第三节 1949—1956年：单方博弈终结报纸产业化进程	57
第四章 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	68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安排	68
第二节 两方博弈：兼顾两个效益	75
第三节 报业制度的创新与扩散	85
第四节 个案研究：两方博弈下的报业集团制度选择	94

第五章 三方博弈：加入 WTO 与报业制度选择·····	105
第一节 加入 WTO 前后的报业制度安排·····	105
第二节 三方博弈：寻求制度均衡·····	114
第三节 从“两分开”到“两分开”：老酒难注新瓶·····	126
第四节 个案研究：跨地区办报制度的收放博弈·····	135
第六章 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	143
第一节 报业改制：从三方博弈走向四方博弈·····	143
第二节 四方博弈中的受众位置·····	151
第三节 受众参与途径：非营利组织·····	157
结 语·····	162
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18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我国报纸从产业化萌芽到现今初具规模，经历了突破式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报纸产业通过前期积累，经过市场转型，实现了日益稳定的增长。30余年的探索，基本完成从粗放式的单一经营到集约式的整体运营的转换。从1996年《广州日报》组建第一家报业集团以来，迄今已组建报业集团49家，包含报业在内的传媒产业在经济领域影响深远，报业的发展既铭刻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印痕，同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规范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在新媒体崛起并普及的今天，报纸如何保持既往的社会影响力与报业实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创新报业制度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工作报告将“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决定了未来报业改革的路径与方向。

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甫一进入中国就被刻上强烈的政治烙印，宣传、导向的属性始终是中国报业演进的逻辑主线。双重属性的表述使报业在政治属性之外赢得了市场空间，经营、资本、利润等核心话语开始进入报业发展体系之中。面对新媒体的竞争，在报纸阅读率下降、报业市场被挤压的今天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发报业潜力、凝结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的竞争力是现今的热门话题。展望、预测报业发展的未来，必然要回溯报业既往发展的逻辑与线索，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媒介经营的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聚焦于报业发展进程：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相当一部分研究都将答案归结为报业制度的调整与变革。这是本书极为认同的观点，它也得到报业发展明确而清

晰的实证：1978年“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的出台，成为我国报业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为产业化提供初始条件；20世纪80年代报纸的自办发行、多种经营制度的局部推进为产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1992年开始讨论、1996年创办的报业集团可以称为产业化进程中的一次整体扩张；跟随中国加入WTO的脚步，报业融资制度启动了产业化最核心的命题。可以说，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不断深入离不开制度的探索。关于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更为精确、明晰的回答。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认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①他认为决定社会荣枯的，只可能是制度；与诺斯相呼应，我国学者邹东涛认为，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②这些结论在经济学领域，在传媒产业的研究领域一直被奉为圭臬。直至今日，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提法的普适性，这样的结论在报纸产业制度研究初期的确意义重大，彼时研究的重心在于回答产业制度的作用、意义这样比较宏观、比较表层的问题，研究视角聚焦于对报业制度静态的梳理、整合和评价上。

如果就这一问题继续追问，就会发现，停留在宏观层阐释远远不够，没有将报纸产业制度变革的微观动力机制描述出来：报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组制度？这组制度是不是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唯一选择？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新制度的出台看作一次选择的话，选择由谁来推动的？制度选择者是谁？这些制度选择者依据何种逻辑来运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本书的生发。以博弈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中的各个利益主体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他们总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出理性的策略选择。基于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便深化为，在博弈视角下参与主体如何选择制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报纸产业化进程进行学理的思考，剖析不同时期产业制度选择主体的策略，寻找我国报业制度选择的动因、轨迹、规律。解答这些问题有助对报纸产业化历程有更清晰的认知，对报业如何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有重要启示。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② 余映丽：《模式中国：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7个样板》，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第二节 研究动机

一 现实层面

对于我国报业发展而言，产业化是不可忽视的路径；对于研究报业产业而言，制度选择成为不可回避的领域。报纸产业制度的初始安排及适时调整应是中国报业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遭遇的困惑，均与报业制度有着最直接的关联。随着我国报业改革的深化，制度选择越来越需要审慎而为，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了我国报业的价值取向、发展规模及增长速度。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天鹏就指出制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有了新闻政策，对幼稚的报业，才有轨道可循，可以逐渐地发展。故此，新闻政策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① 这里的政策与本书所提出的制度具有相似的内核。

新中国成立以来，报业制度获得相当程度的开放与突破，在“坚持社会主义新闻方向，不违反国家新闻政策的前提下，放松对报业经营和发展的直接管制，减少对报业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行政性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形成报业市场有效竞争的格局”^②，已逐渐成为我国报业制度的指导原则。鉴于报业的特殊属性，其市场化、产业化进程较之国企改革更为艰难，徐光春曾言：“报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是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特殊产业。”^③ 报纸产业制度变迁经历了多元利益主体反复博弈才得以实现，“渐进、滞后、冲突、不均衡”^④ 成为报纸产业制度最为恰切的表达。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也认为：“报刊业改革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的难度很大。”^⑤ 报业制度选择

① 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金碚：《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报业产业组织政策》，《中国报业》2000年第1期。

③ 转引自程世寿《媒介产业发展：新闻改革新趋势》，《新闻出版报》1999年3月2日。

④ 周劲：《转型期中国传媒经济的三角分析框架：以传媒治理结构为例》，《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⑤ 龙新民：《转变职能加强监管依法行政开创报刊管理工作新局面：在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媒》2006年第9期。

的复杂性是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最独特的表征，抓住这些特点进行剖析，在一个理论高度来体认报业制度选择行为，才能切中肯綮。“在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具有特色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在历史上再演的”^①，用学理的方式描述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演进过程，对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是具有反思和启示意义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制度创新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报纸产业化问题的探索不仅对报业经济有着现实意义，也可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二 理论层面

报业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成长到壮大的历程，报业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与完善。报纸产业制度每一次调整与变革都是在突破既有制度框架、打破制度均衡下完成的，而这样的选择实际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本书立足于寻找下列问题的答案：我国报业制度选择的参与者推动制度选择的内在动因；在制度选择的过程中各个组织的利益如何分配和调整；选择格局如何建构最为均衡。这些任务依靠原有的分析框架是难以完成的。现有的研究成果忽视了报业制度走势中的细节分析，这实质是将我国报纸产业化历程做了简单化的处理，不能将报业发展的复杂与曲折表现出来，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正如周劲所言：“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传媒，政治风险、自然风险、道德风险、技术风险并存，它的分析空间不像其他领域那样‘光滑’……只有根据中国传媒经济系统的特征重构新的分析空间，才能解释中国传媒经济的这种复杂、独特的、非均衡演化过程。”^②因此，本书“引入新的方法，着眼于新的视角，或许会发现有不少历史迹象应当还其本来面目”。^③

报业制度选择的过程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每一个主体在进行选择的时候目标都极为明确——利益最大化，总会赞同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反对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行为。由制度选择主体“决定哪些制度安排、文化形

① [匈] 亚诺什·科内尔：《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② 周劲：《转型期中国传媒经济的三角分析框架：以传媒治理结构为例》，《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③ 张杰：《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

式和规则将获得持续和再生”,^①而博弈行为的结果同样是参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本书选用博弈视角分析1949年至今中国报业制度选择行为,对报业制度选择的关键点予以重点阐述,对制度选择主体不同阶段所担当的角色着力勾画。本书试图构建报业制度选择的一般模型,厘清我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特征和脉络,展望未来报业制度更为均衡的格局。这套分析框架能够解释报业制度既往的变迁路径,对于以后的制度选择趋势也有着预期与展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模式能从微观的层面使报业制度发展中复杂的、不规则的波动得到更清晰、准确的呈现。

第三节 研究思路

一 逻辑起点

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本书的逻辑起点。经济学假设每个个体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人。^②政府、报社、资本、受众是选择报纸产业制度的主体,他们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行为目的性明确,即“当遇到一连串的选择时会挑选其中他认为是最能服务于他的目的的选择”。^③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现在,报业制度的选择主体都不同程度上对自己行为做出了调节,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各个行为主体在制度选择过程中都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明确的目的。第二,自愿交易,互惠互利。^④之所以称为有理性的“经济人”,其原因就在于报业制度选择主体并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很多情况下还乐于合作,理性的制度主体都深知合作比不合作好。^⑤这是由于在报业制度选择中,损害他人获取利益会遭受其他人的消极抵制或积极报复,从而导致更大的损

① [瑞典] 汤姆·R·伯恩斯坦等:《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周长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② 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 [美] 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徐湘林、袁瑞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④ 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 杨俊一:《制度哲学导论——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失。第三，“均衡—打破均衡—均衡”是理性“经济人”相互博弈循环往复的过程。均衡的状态意味着参与主体改变这一格局不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但人类的逐利本性决定“人类行动的目的是改善个人最近的境况，人类总是倾向于发现机会”。^①只要存在更优选择的机会，经济人就会打破原有的均衡，向新的均衡移动。

必须说明的是，“经济人”所具有的理性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洞察一切事务，掌握全面的信息，所作出的决策总是明智而合理的。以西蒙为首的“有限理性学派”改进这一假设。西蒙指出：“经济行为人在进行决策时，并不能进行最优选择，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完全及所面临问题的高度复杂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决策人不可能进行全面精确的计算。行为人只能追求一个满意的选择方案，而不是最优的选择方案。”^②张曙光描述主体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的差异时，从侧面验证了有限理性假设，“人们在行为过程中总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信息的获取来修正自己的行为”。^③但这种修正“既不会否认初始目标的最大化性质，也改变不了修正后目标的最大化特征……虽然修正后的目标和初始目标不同，也可能与行为结果还有差异，但却是当时当地具体条件下的理性选择”。^④

以有限理性“经济人”角度观察我国报业制度选择，可以发现，有的制度并不是绝对最优的选择，却能够达成均衡，并在制度实施的层面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其原因应归结于制度选择主体的“有限理性”：不可能突变式进行全面革新，只能在互动中选择各方相对最优的策略集。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起点，一方面让我们更清楚地界定产业化进程中参与主体的逐利本质，即推动制度选择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能够阐释制度选择中的一些错位与迂回，这都是正常而合理的，信息的缺乏和格局的复杂使报纸产业化进程充满不确定。

二 研究视角

本书采用博弈视角，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① 王廷惠：《微观规制理论研究——基于对正统理论的批判和将市场作为一个过程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② 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③ 张曙光：《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④ 同上。

（一）制度理论与博弈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

用博弈的视角研究制度问题十分自然，在学术界也非常盛行，经济学家们将制度看作是“博弈的参与者、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①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的生成、实施、变迁过程都由利益博弈决定。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实质是对均衡博弈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它作为许多可能的表征形式一起起着协调参与人信念的作用”。^②我国学者张宇燕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运转的游戏规则……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构。^③美国学者 H. 培顿·扬认为，制度“都是一些有理性但又分散和分立的个人在各自不完全信息中随机博弈的结果”。^④另一种观点认为不仅制度是由利益主体博弈确立，而已经形成的制度又是下一轮制度选择的博弈规则。以诺斯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博弈）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⑤这两种观点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向我们解读了制度理论与博弈理论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为我们构建了最具说服力的研究平台，正如李建德所言：“面对稀缺，人与人之间既有冲突又要合作，既有对抗又要联盟，既要竞争又要通过谈判。因此博弈论是进行制度分析的恰当工具。”^⑥

（二）制度选择过程显示社会需求偏好，是人们之间矛盾和冲突关系的显现

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和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⑦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制度选择不过是利益主体相互制约、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缔约过程，因而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利

① [日]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② 同上书，第 11—12 页。

③ 王廷惠：《微观规制理论研究——基于对正统理论的批判和将市场作为一个过程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5 页。

④ [美] H. 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6 页。

⑤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 页。

⑥ 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4 页。

⑦ 张曙光：《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 页。

益冲突性质。^① 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是：“冲突与合作的结果依赖于所有人所做的选择，每个决策者都企图预测他人可能的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佳决策。”^② 迈尔森认为，“冲突分析”或者“相互影响决策”是描述博弈论更为准确的术语。^③ 基于两者本质上的可类比性，可以将制度选择表述为：通过主体间的博弈，使新的制度安排从旧的制度安排中脱颖而出。从博弈的视角切入我国报业制度选择研究，能够更为清晰地呈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制度选择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时间路径完全取决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④

（三）博弈视角的切入能更准确、更系统地抽象出制度选择的内核，将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去掉，使研究更加深入和简练

博弈视角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在于能“把问题放在忽略掉现实中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的一个简化模型中加以考虑”。^⑤ 博弈论的提出使参与者之间的行为结构成为研究的重点，即“谁做什么？何时做？掌握哪些信息？”^⑥ 报业制度选择研究中博弈理论的引入便于研究者将次要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使重点突出、主干清晰。本书聚焦于报业制度选择参与者行为的分析，旨在阐释影响或决定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基本走势的主要力量有哪些，这些力量之间是如何作用的。通过报业制度选择主体行为的考察能够发现答案。

（四）用博弈视角研究报业制度现阶段还相当匮乏

近年学界已经开始运用博弈视角进行传媒产业制度的分析，相当多的学者意识到博弈理论能够抓住制度问题的本质与规律。如童兵认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

① 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② [美]戴维·M.克雷普斯：《博弈论与经济模型·译者序》，邓方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页。

③ [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于寅、费剑平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④ 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3页。

⑤ [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于寅、费剑平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⑥ [美]戴维·M.克雷普斯：《博弈论与经济模型》（译者序），邓方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页。